

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与现代性批判^{*}

刘国胜

【内容提要】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经济学转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不是要消灭哲学，而是要实现哲学的自我革命和发展。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的必然逻辑，它不仅实现了对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超越，而且也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无法逾越的科学高峰。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统一，开辟了对现代性批判的新路径。正确认识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方法论的意义上发掘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 政治经济学批判 现代性

作者简介：刘国胜（1966-），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4）。

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其经济学转向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通过这一转向，马克思不仅实现了对真正的实证科学的现实“描述”，而且还实现了对资本与现代性历史秘密的重大“发现”。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统一，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的时代精神，开辟了对现代性批判的新路径。

一、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何以必要

工业化以来，现代社会越来越依赖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特别是在当今的数字化、信息化时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愈加明显。那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独立和发展，是不是意味着现代社会可以彻底摆脱形而上问题的宰制、进入到无哲学时代？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为了化解现代性危机，现代西方哲学就“哲学的终结”这一话题展开了学术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哲学观进入了学界的视野，尤其是马克思关于“消灭哲学”的提法，更是引起学界的关注。我们知道，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就有“消灭哲学”的论述。在对德国实践政治派的批评中，马克思说：“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在对德国理论政治派的批评中，马克思又说：“该派的根本缺陷可以归结如下：它以为，不消灭哲学，就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①从形式上看，马克思这里的“消灭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哲学的终结”都表达了否定哲学的主张，尽管这两个命题在逻辑上是否具有必然的联系还存在争议，但是它们所表达出来的哲学观无不是对现代

* 本文系湖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阐释”（2017012）的阶段性成果。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性批判的理论产物。所以，要真正发现哲学的意义，深入揭示“哲学的终结”命题的实质，重新认识马克思“消灭哲学”的思想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如果按照“消灭哲学”是否定哲学本身来理解的话，那么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从哲学学科转向经济学学科？如果马克思“消灭哲学”不是否定哲学本身的话，那么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是不是意味着马克思哲学的自我革命、自我发展？可见，如何认识马克思“消灭哲学”的思想，不仅关系到我们对现代西方哲学关于“哲学的终结”观点的认识，而且关系到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的理解。

马克思是真的要“消灭哲学”吗？无论是从文本还是从思想史的视角来看，这一观点都似乎成立。从文本的视角来看，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消灭哲学”的提法并非孤证。在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下简称《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认为：“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① 此处的“哲学的丧失”，是很多学者论证马克思“消灭哲学”的重要依据。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是：“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② 这里对哲学“取代”的说法，被学界看作是马克思“消灭哲学”的又一明证。此外，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有一处说法：“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切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③ 马克思的这一论述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消灭哲学”，但将“哲学”与“共产主义”分离开来，也成为学界论证马克思“消灭哲学”的重要例证。从思想史的视角来看，马克思自19世纪50年代后创作的哲学著作并不多，晚年更没有专门写作一部纯粹的哲学论著，这也是事实。那么，这些从文本和思想史中发掘出来的“证据”，是否就说明马克思主张消灭哲学呢？

哲学是马克思把握现实的重要方式。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此作了特别的说明：“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④ 所以我们不能离开马克思理论创作的思想语境，仅仅从词句的意义上进行推断，否则，必然在研究中陷入历史与逻辑相矛盾的学术困境。马克思的“哲学的丧失”“哲学的消灭”“哲学的取代”等用法，旨在表达对当时占据统治地位或处于思潮中心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是对哲学的自我反思。从《博士论文》来看，马克思说的“哲学的丧失”是在阐述哲学世界化与世界哲学化这一命题时，针对“哲学的实现”而讲的。马克思认为，从客观来看，无论是哲学还是世界，都是有内在缺陷的：哲学之所以要世界化，就是因为哲学缺乏世界所具有而自身没有的实体；反之，世界之所以要哲学化，就是因为世界缺乏哲学所具有而自身没有的精神。所以，在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的双向互动中，哲学和世界都应找到自身的实现方式，从而也就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追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哲学就与世界处在分离状态，从而使精神与实体维持一种紧张乃至对立的关系，从而哲学也就丧失了自身的存在价值。从主观来看，自我意识（人或人的自我意识）内在地包含了对哲学与世界的“双刃要求”：“其中一面针对着世界，另一面针对着哲学本身。因为在事物中表现为一个本身被颠倒了的关系的东西，在这些自我意识中表现为二重的、自相矛盾的要求和行为。这些自我意识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就是把它们自己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中解放出来。”^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页。

由于“对象”已经成为“一个本身被颠倒了关系的东西”，所以自我意识对哲学与世界的“双刃要求”就从哲学的世界化与世界的哲学化现实地转换为自我意识对哲学与世界的“双重要求和行为”：宗教的世界哲学化和哲学的自我意识化。自我意识成为哲学与世界的最高目的，二者在自我意识中高度统一：人或人的自我意识成为主体，哲学成为人的哲学，世界成为人的世界。由此可见，马克思无论是在客观上还是在主观上，都没有对哲学本身的否定意思，反而表达了一种对哲学新的认识与要求。如果说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哲学的丧失”还是以黑格尔哲学范式对哲学进行重新认识与要求，那么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消灭哲学”则是直接针对黑格尔式哲学的。马克思指出：“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①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要“向德国制度开火”，“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自我异化”，这对于当时德国的哲学来说，却是难以完成的“任务”。尽管当时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学说是“不低于德国的实践和为实践服务的理论”，是真正“当代的哲学”，但它本质上还是黑格尔思辨的法哲学的“表述”，而黑格尔思辨的法哲学，仍是那种“置现实的人于不顾的关于现代国家的思想形象”的“抽象而不切实际的思维”，这一思维的抽象不仅不能实现将“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现代化水准，而且也不能“达到人的高度的革命”。所以，马克思明确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②正是从这一时代高度，马克思提出了“消灭哲学”，表达了对黑格尔式哲学的批判。同样，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有关“哲学的取代”“哲学的责难”的说法，也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以及所有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哲学的批判，而不是对哲学本身的否定。

由此可见，作为马克思哲学观逻辑发展的一环，“消灭哲学”不是其哲学的“终结”，而是其哲学新的“开端”。马克思认为，哲学不应“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③，而应把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④。问题逻辑是实践活动的理论概括。所以，实践自觉构成了哲学首要的基本原则。“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⑤马克思由此确立了在实践基础上主客体现实统一的哲学观。在这一基础之上，马克思科学阐述了他对“真正的哲学”的独特理解。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是“文化的活的灵魂”^⑥。但由于马克思当时还没有将实践建构为哲学首要的基本原则，其“真正的哲学”也就没有达到它应有的哲学高度。只有实现问题的实践转向，将“真正的哲学”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哲学史的根本变革。所以，这一“真正的哲学”既不是思辨的“哲学”，也不是离开哲学的“经济学”，更不是以知识为对象的“自然科学”，而是面向人的“历史科学”——“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⑦毋庸置疑，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所表达的是哲学史上一种崭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开问世，是马克思对哲学批判的思想结晶。马克思这一新的世界观、历史观的创立，无疑为马克思哲学所要实现的作为“真正的实证科学”的经济学转向提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1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6页，脚注②。

供了理论前提和基础。一般实证科学“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①。马克思把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的分析放到更宽广的历史时空隧道给予审视，把经济现象镶嵌到社会历史发展的有机体中进行透视，这是其理论的深刻和创新之处。实践性、批判性和革命性构成了“真正的实证科学”不同于一般实证科学的思想特质。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② 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深刻地表达了其哲学的经济学转向的必要性：哲学不应停留在思辨王国里，而应走进生活，关注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过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分析的基础上完成对现实的批判。所以，作为“历史科学”必然结果的“真正的实证科学”，不是对人性、对理性的抽象论证，也不是对财富、对增长的实证分析，而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③。这一承载历史唯物主义使命的“真正实证科学”，公开地表达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标：对作为历史基础的市民社会的描述，才是阐明全部意识的“科学的入口”^④，而不是相反。这种问题意识的根本置换，提出了由（自我）意识的探索转向对生产关系的研究的理论进路，体现了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科学实践性的根本要求，蕴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创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回到生活世界做有限的经验描述和实证分析，而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维度展开对现实的再批判，这无疑是在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的内在要求和根本任务。

二、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何以可能

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的理论背景是黑格尔哲学不能正确解释现实。尽管在将自我意识建构为主体性、将哲学改造为自我意识哲学的思想探索中，马克思所表达出来的哲学观及其方法，在某些方面不仅超越了黑格尔，而且也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其他重要成员，但是在其哲学变革和转向之前，马克思的哲学仍然较深地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影响。

哲学信仰的危机来自信仰的哲学危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信仰的动摇来自黑格尔哲学本身的动摇。马克思曾经说：“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⑤ 对此，梅林的解释是，马克思之所以感到困难，是“由于必须谈到黑格尔思想体系中所没有考虑过的物质利益问题”^⑥，从而也就无法对此做出哲学的分析与批判。在黑格尔那里，物质利益“是一种为思辨哲学所溶解、所羽化的东西”^⑦，作为世俗事物的现代性形象与“绝对理性”相分离与对立，所以黑格尔即使遇到马克思的“难事”，他解决问题的方式依然是其思辨哲学式的解释方式，即问题的抽象化、非现实化。显然，在这种思辨哲学式的解释方式里，马克思没有发现问题，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物质利益’问题实际地、本质重要地介入到马克思先前

① [德] 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1页。

⑥ [德] 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持平校，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6页。

⑦ 吴晓明：《思入时代的深处：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世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7页。

的单纯理性的世界观之中，而且该问题的介入第一次以超出这种世界观体系的方式向单纯理性的观念提出了尖锐的挑战。”^①因此，对马克思来说，要彻底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就必须摆脱黑格尔哲学范式的束缚，重建对物质利益的解释方式，变革把握世界的世界观及其问题视阈的阐释路向。“马克思最终放弃了用哲学构架来描述周围世界和社会历史的理论方式，而转入了对社会现实的科学研究（以恩格斯的说法，在那个时候‘现实就是经济学’）。”^②由此可见，如何把握物质利益问题，就成为马克思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分离、划界的重要界碑，也是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的现实起点。对马克思和黑格尔这一哲学关系，熊彼特也有评论：马克思“喜欢证实他的黑格尔主义和使用黑格尔派词汇，但也只此而已。在任何地方他也没有背叛实证科学而依附于形而上学”^③。熊彼特其实并没有把握到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的真实意义，但他看到了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及其理论动向。

物质利益问题首先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经济学的问题就必须从经济学的语境中进行批判。从自我意识问题转向物质利益问题，意味着必须从法学、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这不是哲学的倒退，而是回归其本真精神。毫无疑问，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哲学这一实践转向提供了理论途径。从现代学科的发展来看，政治经济学是当时唯一发展成熟的、关于“物质利益”本身的、“真正的实证”科学。所以，“转向或进入政治经济学，也就意味着转向或进入‘物质利益’本身的领域”^④。那么，如何转向或进入政治经济学呢？从黑格尔、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来看，我们发现了两条不同的理论进路。

第一，从黑格尔的经济学进路来看，黑格尔有没有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对这个疑问，卢卡奇的回答是：黑格尔“是唯一的德国思想家，曾把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与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在他对伟大的法国革命的革命理想发生迷惑的时候，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研究，他对英国的经济情况的分析研究，给他提供了指南针，使他走出了这个迷宫，找到了他通往辩证法的道路”^⑤。其实，黑格尔的经济学研究并没有像卢卡奇所说的走出了“迷宫”。问题不在于黑格尔有没有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而在于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什么。首先，黑格尔对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解。黑格尔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从“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然后按照群众关系和群众运动的质和量的规定性以及它们的复杂性来阐明这些关系和运动的一门科学”，“可以从中见到思想（见斯密、塞伊、李嘉图）是怎样从最初摆在它面前的无数个别事实中，找出事物简单的原理，即找出在事物中发生作用并调节着事物的理智”^⑥。这表明，在黑格尔那里，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人的需要和劳动以及它们所构成的关系和运动，其任务在于从个别事实中发现“原理”。从这个意义上说，黑格尔是以哲学的方式研究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德国哲学的任务。其次，黑格尔怎样以哲学的方式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对“需要及其满足的方式”中，黑格尔虽然看到了人与动物的区别，但黑格尔对人的理解却是抽象的：“在法中对象是人（Person），从道德的观点说是主体，在家庭中是家庭成员，在一般市民社会中是市民（即 bourgeois [有产者]），而这里，从需要的观点说（参阅第123节附释）是具体的观念，即所谓人（Mensch）。”^⑦正是因为从观念中把握人，所以黑格尔对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劳动关系也作了抽象化的处理：“抽象化引起

① 吴晓明：《思入时代的深处：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世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3页。

②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页。

③ [美] 约瑟夫·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 十大经济学家》，宁嘉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6页。

④ 吴晓明：《思入时代的深处：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世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8页。

⑤ [匈] 卢卡奇：《青年黑格尔》，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3、24页。

⑥ [德]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04页。

⑦ [德]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05-206页。

手段和需要的细致化，从而也引起了生产的细致化，并产生了分工……生产的抽象化使劳动越来越机械化，到了最后人就可以走开，而让机器来代替他。”^① 在这里，黑格尔虽然揭示了抽象劳动的意义，并对现代社会的技术化现象做出了合理判断，但是，由于黑格尔是在观念中把握“人”，所以黑格尔也是在精神层面把握劳动关系的，从而也就难以对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进行科学描述。从这个意义上说，黑格尔政治经济学的哲学研究整体上并没有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后，黑格尔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政治经济学思想是通过三个理论环节展开的：“需要及其满足的方式”“劳动的方式”和“财富”。这三个理论环节分别涉及人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但是我们从这三个理论环节里没有看到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运动。由于这些环节又是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下的第一个环节的逻辑展开，如果再加上其他两个环节，我们同样发现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仍然不过是理性的思维运动：“在市民社会中，理念丧失在特殊性中，并分裂为内外两面。”^② 总之，黑格尔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仍然束缚在抽象缔造的形而上学王国里，抽象统治一切。所以说黑格尔以形而上学的方式进入经济学并不成功，其经济学研究只是对其“逻辑学”的补充，从而也就不能解放自身。

第二，我们再从马克思的经济学进路来看。与黑格尔相比，马克思的经济学转向的科学性、先进性就体现出来了。对于同样面对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两位哲学家都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但为什么黑格尔就不能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而实现哲学的自我革命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抓住现实的人的问题。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③ 不可否认，黑格尔也抓住了人，但他抓住的是人的精神、理性，所以，面对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的拷问，黑格尔哲学交不出答卷。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占据德国哲学之外另一个理论高地，就在于它深入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即经济关系之中，抓住了人的物质、感性。对于人本身或者说人的本质来说，现实的经济关系无疑是其最基础的方面。马克思超越了两方，将哲学论域从人的自我意识转向人的生活，从而开辟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路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哲学—经济学双重批判的重要作品。在该著作中，马克思首次进入经济学语境，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批判。首先，马克思将《莱茵报》时期物质利益问题具体化为工人的利益问题，揭示了工人利益与资本家利益的对立及其根源；其次，马克思阐述了异化劳动的表现形式、根源和后果；最后，马克思还考察了私有制的形式与本质。这些批判无疑是经济学中的根本问题，从而也是现实的人的根本问题。尽管受到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观点的影响，手稿的理论分析中哲学的、伦理的成分多于科学实证的成分，但是这也表明马克思哲学实现经济学转向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对现代经济生活所作的第一次比较系统的、深入的解释。“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为他经济学科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为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形成奠定了方法论基础。”^④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引下，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实现了其哲学的经济学的真正转向。这一时期，是马克思全面进入经济学研究、深入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创作阶段，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经济学手稿”及其经典之作《资本论》，它自觉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史上的第三次重大转折^⑤。“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真实成果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成果

① [德]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10页。

② [德]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3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④ 顾海良：《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两种形式及其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12期。

⑤ 参见陈学明、姜国敏：《论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江海学刊》2016年第2期。

是《资本论》。”^①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以商品为逻辑起点，对以资本为核心范畴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制度和理论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辩证法和认识论高度统一起来，从而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最终达到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双重批判的目的。黑格尔解放了辩证法，却不能合理地用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来；马克思则不仅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基础，为经济学分析提供科学的历史观，而且还将辩证法充分用到经济学研究中，从而为对资本主义批判性的“实证研究”开辟了一条政治经济学批判道路，为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在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问题上，笔者认为，不能将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与英国古典经济学理论相等同或混淆。当代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就是此论的代表人物。尽管熊彼特对马克思关于经济发展过程等思想作了较为积极的评价和阐释，但是总体来看，熊彼特对马克思学说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认识。在熊彼特看来，作为李嘉图的“学生”，马克思的论证“是从李嘉图的命题出发”，更重要的是他“从李嘉图那里学会了推理技术”，他“总是使用李嘉图的工具”，他的“价值理论是李嘉图式的”^②；作为一个只能采用或修改李嘉图经济学概念和命题的价值学说，只能是属于“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经济学”^③。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熊彼特更是认为“站不住”^④。熊彼特的根本错误在于，他不能做到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关系“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⑤，不能做到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上“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⑥。所以，如果仅仅看到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而不去发现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内在关系，不去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对经济学研究的指导意义，不去把握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经济关系研究的科学思维方式，必将重蹈熊彼特这样的理论“陷阱”。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是对黑格尔哲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超越，而且也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无法逾越的科学高峰，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和经济学的有机统一。

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开辟的现代性批判新路径

在马克思哲学中，现代性批判思想一直占据重要的理论地位。从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来看，马克思始终将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统一起来，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实现对现代性的发现、批判与重构。所以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无疑为现代性的批判开辟了一条新的理论通道，实现了他从理性的现代性批判到资本的现代性批判的内在超越，从而将现代性批判推进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高度。

作为现代性的重要支柱，理性是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不断论证和建构的“时代精神”。现代社会的确立，不仅是工业化的历史过程，也是现代文化观念重构的思想过程，由此，理性主义一直将理性看作是从宗教世界到世俗社会转变的内在动力和精神支柱。所以，现代性的建构也就是理性原则的确立。“当18世纪想用一词来表达这种力量的特征时，就称之为‘理性’。‘理性’成了

① 《现代资本主义的来历和界限——王德峰：马克思哲学解读当代人类经济生活中的资本逻辑》，《文汇报》2014年3月19日。

② [美]约瑟夫·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 十大经济学家》，宁嘉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3、34页。

③ [美]约瑟夫·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 十大经济学家》，宁嘉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5-36页。

④ [美]约瑟夫·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 十大经济学家》，宁嘉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3页。

⑥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18世纪侵染着一种关于理性的统一性和不变性的信仰。”^①在对宗教的批判过程中，人性的意义和人的价值最终从启蒙运动中呈现出来。启蒙是什么？把人从神、把人性从神性、把人的存在意义从神的存在意义中解放出来，把人的世界归还人本身，这就是启蒙。所以，启蒙实质上是以理性的原则和方式实现从神到人的神像还原、历史求真的“祛魅化”。“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②，所以人“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③。在这里，康德明确表达了他对理性自由的启蒙要求。为了真正开启启蒙的现代性之路，康德从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两个层面，阐述了理性的认识论意义和伦理学意义，从而表达了在现代性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和认识。黑格尔则将对理性的认识推进到本体论阶段。“理性是世界的灵魂，寓于世界之中，是世界的内在东西，是世界最固有、最深邃的本性，是世界的普遍的东西。”^④和康德相比，黑格尔试图在认识论和伦理学之外为理性找到它为现实服务的新途径，所以法哲学和国家学说就成为黑格尔论证理性、建构现代性的重要阵地。毫无疑问，康德和黑格尔这一理性之上的现代性哲学观念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黑格尔哲学的引领下，马克思开始用理性重新审视哲学与世界的关系，并最终在理性原则的基础上建构了他关于自我意识的理论框架与思维方式。但是，正如上文所述，这一理性主义框架与思维方式在“物质利益问题”面前遇到“难事”了：黑格尔“理性的法”和“私人利益”发生了矛盾。这一矛盾无疑动摇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解决现实问题的信念。为了找到问题的解决方式，马克思一方面展开了对黑格尔理性观的批判，揭示了黑格尔绝对理性思维范式的内在悖论；一方面转向经济学，寻求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完成对资本的现代性的现实批判，实现了对现代性本质的真正认识。

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观的批判是他对现代性形而上学批判的集中体现。黑格尔以抽象的理性为现代性原则，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现代性形而上学理论体系。马克思对这个抽象理性的现代性原则展开了深入批判。其一是对黑格尔“绝对理性”概念的批判。黑格尔不仅以绝对理性建立了“绝对科学”、绝对哲学的理论体系，而且也以绝对理性构建了现代社会的政府机构、法庭、新闻机构和其他不同现实版本的权力和制度体系。所以，全部的政治、法律、新闻等条文无不是这一绝对理性的现实表达。但由于黑格尔将物质利益问题从这一绝对理性中分离出去，从而也就将真正属于人的现实的东西从人的本质中切离开来，也最终将绝对理性抽象化为神性。所以黑格尔的绝对理性实质上是用黑格尔哲学表达出来的神性，这无疑背离了启蒙所要建构的现代性，与康德的批判理性相比反而是一种倒退。为了使将理性作为现代性原则的时代精神真正彰显出来，马克思以人民理性对抗绝对理性，从而将理性世俗化、现实化。“一个国家如果像古代雅典那样把谄媚者、寄生虫和阿谀逢迎之徒当作违背人民理性的人和人民中的丑类来加以惩处，这样的国家就是独立自主的国家。”^⑤随着唯物史观的确立，马克思将人民理性建立在无产阶级实践的基础上。“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⑥毫无疑问，这种为人民争取利益的斗争的理性具体而深刻。其二是对黑格尔国家理性原则的批判。“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

① [德] E·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页。

② [德]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3页。

③ [德]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5页。

④ [德] 黑格尔：《逻辑学》，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5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页。

理性的东西，因为它是实体性意志的现实，它在被提升到普遍性的特殊自我意识中具有这种现实性。”^① 黑格尔将绝对理性现实化的结果就是国家理性成为现代性之源，支配着市民社会。马克思认为，国家理性是特殊意志的体现，它总是由现实的经济关系所决定。所以国家理性并非市民社会的先验前提，相反，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现实基础，是现代性建构的历史根基。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之谜”不在大厦之顶的国家理性中，而是隐藏在黑格尔所轻蔑、忽略的“市民社会”中。其三是对黑格尔理性的思维方式的批判。马克思认为，由于黑格尔理性概念的自身矛盾，理性在自身中把自己和自身区分开来，所以理性最终成为“无人身的理性”。显然，“无人身的理性”并不是启蒙运动所要建构的现代性。那么，为什么黑格尔现代性的理性概念会出现这一自反的悖论结构呢？在马克思看来，这与黑格尔的绝对方法有关，“那么，这种绝对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粹理性的运动”^②，是其抽象的理性思维方式的逻辑产物。

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这一重大发现，不仅批判了黑格尔的绝对科学和绝对方法，而且也批判了黑格尔的绝对对象及其历史根基。这一批判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开端，而不是终点。“马克思认为造成社会危机的根源是现代资本，正是资本使人成为一种失去生存意义的工具性存在。在现代性问题上，离开了对资本的批判，不仅是肤浅的，而且带有虚伪性的本质。”^③ 所以，作为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的根本标志，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和实质就是对作为现代社会根本原则的资本的批判。“《资本论》从根本上讲，就是一部现代性批判理论。”^④ 资本是理性之后现代性的又一重要支柱，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是现代性批判的最终完成。当然，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并不是无原则的批判，他与完全无批判的实证主义的根本区别是：“牢牢地把握了资本这一现代性原则的历史前提和历史界限，依循此种前提和界限构成对资本原则之内在本质的决定性批判。”^⑤ 马克思认为，要彻底批判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就必须深入到市民社会中，实现哲学的经济学转向，将对现代性的抽象批判转向对现代性的具体批判。市民社会是现代社会关系的发源地，也是现代性价值建构的历史基地。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对由理性建构起来的这种现代社会生活充满了种种幻想。所以，要穿过理性的现代性所虚构的层层迷雾，批判资本的现代性，就要从市民社会中发现真实的经济关系。“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⑥ 马克思认为，在所有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中，资本是财富的现代社会存在方式，是占据支配一切生产过程和其他经济领域的经济权力和决定性因素。“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⑦ 所以，只有深入到经济学的现实根基，资本的历史本质才会褪去它神秘的“外衣”。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不仅在于揭示它的历史性，从历史前提中考察它作为交换手段的特殊价值，而且更是从生产过程和历史现象中发现它的社会本性。“资本的统治不是狼对羊的欺负，而是在物质生活领域内，对私人劳动与社会总劳动的关系的规定。它是支配当代人类生命活动的一条法则，这

① [德]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5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1页。

③ 吴晓明、邹诗鹏主编：《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性问题》，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154页。

④ 吴晓明、邹诗鹏主编：《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性问题》，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157页。

⑤ 吴晓明、邹诗鹏主编：《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性问题》，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135页。

⑥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3页。

⑦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8页。

条法则就是，每个个体的特殊的具体劳动必须服从于抽象劳动之增长（货币之增殖）的目的。”^① 马克思认为，资本本来是由货币发展而来的，是作为交换手段、价值中介而存在的，但是由于它在工人劳动过程中，显示出超出它自身存在的价值，即资本主导了现代生产方式，这就使之呈现出两个根本特征：一是商品生产成为普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式，二是资本的增殖性决定了生产的全部目的。“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② 所以，将现代性的矛盾或危机，进一步说，将资本主义的矛盾或危机仅仅归结为理性，特别是现代科学，是片面的，甚至也是虚伪的。离开对资本的批判，我们不仅不能把握现代生产方式的存在方式，而且也不能认识到由这种生产方式而引起的拜物教现象，更不能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资本的批判不仅是对理性批判的前提，而且也是整个现代性批判的核心要义。

由此可见，从理性的现代性批判到资本的现代性批判，是马克思哲学向经济学转向的内在逻辑和必然结果。马克思对资本的现代性批判，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真正批判。不难发现，马克思的这一批判，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双重路径的现实结合而实现的：作为从物质实践出发“完整地描述事物”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作为研究现代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充分证明和运用。可以说，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政治经济学批判；没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没有对资本的现代性的批判。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视界融合和理论重构。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一种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社会形态中的具体呈现。

总之，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是马克思哲学面向现实、面向问题、面向实践的必然表现，它不仅实现了马克思哲学的自我发展，而且也推进了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性的现实批判。正确认识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方法论意义上发掘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孙伯鍔、侯惠勤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与现状》（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 [2] 赵剑英、庞元正：《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现代性建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 [3] [法] 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 [4] 唐正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层次》，《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 [5] 曹典顺：《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关联》，《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编辑：张 剑）

^① 《现代资本主义的来历和界限——王德峰：马克思哲学解读当代人类经济生活中的资本逻辑》，《文汇报》2014年3月19日。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9-390页。